

# 晚清开埠后福州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化

## ——以西方人的考察为中心

吴巍巍

(福建师范大学 闽台区域研究中心, 福建 福州 350007)

**[内容提要]**晚清入华西人群体对开埠后的福州城市社会经济给予了多方位的微观考察和描述。通过西人的笔触,可以更为直接和细致地窥见通商口岸城市在西力冲击和延续传统格局的双重影响下所发生的变化气象,深刻反映了通商口岸城市逐渐步入近代化历程的因应转型之趋势。

**[关键词]**晚清;福州;社会经济;西人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2x(2014)04-0069-10

鸦片战争后,福州成为首批开埠的通商口岸城市之一。开埠后,西方人得以登陆福州口岸正式开展商业贸易,在中西贸易不断深入的过程中,逐渐给福州城市及周边地区注入新的血液,使得福州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呈现许多有异于传统的变局气象,并使福州逐渐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殖民贸易的一环。对于福州在开埠后经济社会出现如何的变化气象,以往学界之关注多为宏观介绍,而较缺乏细部的考察<sup>①</sup>。近年来,随着史料的进一步挖掘和利用,我们发现在西方人留下的众多著述文献中,记载了大量有关晚清福州、厦门等口岸城市经济表现面与发展变化的细节情况,这些微观的描述对于我们了解和把握当时口岸城市经济动态提供了极佳的资料证据。为了更细致地勾画这一历史图景,本文力图在较为全面掌握西文文献(包括西人著作、文章、信件、日记、回忆录、纪念文集等)的基础上,以西人的记录为考察中心,并通过与福建地方文献的参照比较,对晚清时期福州被辟为通商口岸城市后,其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变化之格局,作进一步的讨论。

### 一、“西势东渐”下的闽江口经济繁荣区

闽江口主要指闽江下游连接入海口位于福州城市段的江面,该段江岸及岸上街区是清末福州人流最为集中、商贾小贩最为忙碌的区域,大小船只密密麻麻,进出货物装卸繁忙,很大程度上反映着闽省经济的发展脉搏,正如时人所言:“南台距省十五里,华夷杂沓,商贾辐辏,最为闽省繁富之地”<sup>②</sup>。当时西方人来榕后,也是首先集中于此一区域,这里的南台,主要包括今福州台江区南面与仓山北面及两区之间的水域,这是当时福州经济中心地带之一。众所周知,西方人尤其是商人来福州后,即开始迫不及待地将西方商品引进榕城,除了罪恶的鸦片,尚有棉布、纱布及其他西方制品,但西方货物除了鸦片外其他的并不畅销,反倒是福州作为福建茶叶贸易中心,成为向西方国家出口茶叶的巨大基地,而这也正是西方殖民者当初为什么坚持要求开放福州的主因(虽然福州开辟为通商口岸后并没有马上给他们带来预期的效果)。在闽海关 1865 年初次的年度贸易报告中,记录了自 1842 年福州口岸开埠以来贸易情况,提到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3AZJ007)、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1CZJ007)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11JJD810004)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4-08-06

在开头十几年,鸦片和茶叶是本口贸易主要支撑,从1856-1861年,茶叶贸易继续稳步和急剧发展<sup>③</sup>。外国商船运载洋货来榕和闽江口本地乌篷船运载茶叶络绎不绝,码头岸边搬运工人也繁忙地装货卸货,由此也刺激江岸两边人潮涌动、商贾小贩摆摊做生意的局面。晚清开放通商口岸后,西方国家因为发展福州市场的需要,还开辟从外国到福州的航线,不少公司的轮船运载货物到达福州,导致了福州南台江面船舶林立,外国货轮与本土木帆船、乌篷船密集交织的画面<sup>④</sup>。在当时,逐渐形成一个以万寿桥(解放大桥前身)为轴线,以闽江口江岸为基面,以南台两翼为外围的经济繁荣区。这种人文景观,是福州开埠后“西势东渐”刺激作用下的一个结果。对此,我们可以从西文文献找到不少这方面的记述和描画。

英国圣公会主教四美(George Smith,也被译作施美夫)在福州逗留期间对闽江两岸尤其是船上居民经济生活的细致观察:“天不亮就被吵醒。新邻居都是船民,喧嚷嚷地在水上忙碌着。我走到阳台上,静静地观看下面混杂的人群。许许多多的船被贫穷的船主当作居家,一条一条沿着江岸两边排列了3里路长,最主要的聚集点就是小岛(笔者注:指中洲岛)四周。……我在福州逗留的后半期,一般都住在南台郊区两桥之间的小岛(即中洲岛)上。这个郊区的主要部分在闽江两岸,有20万居民。大多数人都都是船民、水手、宁波籍及其他地方坐商船来的人。这个地方盛产鱼、水果、蔬菜,到处摆着出售。水果和蔬菜是体格健壮的乡下女人送到这里来的。她们身板结实,步履矫健……”<sup>⑤</sup>,这些记载虽朴实平淡,却真实反映当时人们日常经济生活的状态。当中,对闽江江面船舶拥杂繁多的记述、闽江两岸码头工人忙碌的身影、乡下菜农妇女挑运货物进城贩卖等情景,都可谓清末福州辟为通商口岸后百姓日常经济生活的图照与缩影,让人深刻感受闽江船民和底层苦力及各行业劳动者等工作生活状态的艰辛。

不仅江上繁忙,船只穿梭如织,万寿桥两边也是摆卖了摊贩,做着生意,“桥上被商贩占据,有点像旧时代的伦敦桥,窄窄的通道通常挤

满各种各样忙着赶路的人”<sup>⑥</sup>。对此,英国圣公会的施友琴(Eugene Stock)也写到:“我们站在(万寿)桥上并穿过这种方式的中国街道,放眼望去视野开阔,各种各样景象尽收眼底。一派多么繁忙和混杂的景象!熙熙攘攘的人流快速涌动,很少冲突,也少有争吵……在这我们发现显而易见的混乱无序却尚未有骚乱——一群拥挤攘攘的贪婪的商人使出浑身解数向那些围绕在他们周围的人们推广其生意”<sup>⑦</sup>。美以美会第一任会督、曾在福州传教的怀礼(I. W. Wiley)也言道:“中洲岛上居住的人口众多。……这里是福州最繁忙、景色最吸引人的地区之一。商店、作坊、工厂、市场、银行、寺庙、牌楼及其他公共建筑应有尽有。连接城市和郊区的主要干道从早到晚熙熙攘攘,一片繁忙的景象”<sup>⑧</sup>。

总之,通过西人的笔触,我们不难看出晚清时期地处闽江最下游的福州南台两岸地区是福建经济贸易的枢纽,无论是闽省内地与沿海地区的山海贸易还是晚清开埠后的中外通商贸易,都在这里交集汇聚,造就了闽江最下游地段船舶辐辏聚集、江上码头工人辛勤劳碌、两岸商行店铺林立,商业贸易一派繁忙兴盛的景象。

## 二、贸易网络与街市商品经济的发展

福建是一个商业贸易网络较为发达的省份,沿海对外商贸自古以来即驰名于世,省内府县之间的贸易网也四通八达,尤其以闽江流域和九龙江流域为依托,形成以福州和厦门为中心基地的内部商业贸易体系。晚清“西势东渐”以降,外国人与福建的贸易关系更加密切,口岸城市进一步健全其商业贸易网络,同时,城市内部的街市商品经济也得到很大发展。这方面,福州与西方国家的茶叶贸易,可谓突出的代表性事象。

晚清以来随着中外贸易的广泛进行,茶市得到很大发展,茶叶贸易成为福建出口贸易的大宗,成为商业市场中一块重要内容。这一景况,在西文文献中亦有较详细的反映。众所周知,英国要求清廷开放福州一个明显目的就是更为便利地从事茶叶贸易,因为西方所饮之茶多为武夷茶。从武夷山到福州比到广州,运费和转手费可大大降低,因此英国十分觊觎这

个市场,不过福州刚开埠后对外贸市场几乎一片沉寂,主要是由于福建主政官员的暗中阻扰,福州民众未敢与“夷人”贸易<sup>⑨</sup>。直到1853年情况才发生转折,该年,太平天国运动和上海小刀会起义切断了武夷山运往广州的旧茶路及运往上海的新茶路,福州成为武夷茶区唯一能保持出口路线畅通的口岸,这样,中外商人只得在福州一口从事茶叶贸易,从而使福州一跃成为国际茶叶贸易的中心之一<sup>⑩</sup>。

美国传教士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1850年抵榕至1873年返美期间,正处于福州茶叶贸易迅速发展的阶段,由于他常深入民间社会调查,后来又担任琼记洋行的翻译,直接参加了茶叶贸易的全过程,因此对福州茶叶贸易盛况有直观的认识和深刻体会,并在其著《英华萃林韵府》(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中留下了有关此方面的丰富记录。书中记载:由于福州成为福建茶叶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和茶叶的重要产地,在福州从事茶叶贸易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当时茶行里的分工已经非常细致,计有“看更,理茶工人,打藤人,裱箱人,买办,帮买办,管帐先生,报税人,茶楼人等,秤手,装茶人,筛茶人,焙茶人,铲茶箱人,打铅箱人,做茶箱人……”等林林总总达五六十种之多,可见茶市的繁荣景象;此外,在福州销售的红茶中,“最上等的品种如工夫和小种,主要来自下列地区:它们大都位于福建武夷山,如星村,赤石街,倡口,邵武……;福州的青茶,如乌龙和宝春,大部分来自下列地区,如沙县、高桥、高沙、洋溪、尤溪、永安、福安、宁洋;最好的白毫则大部分来自邵武、梨源、将口、小湖、麻沙、仁寿、屏南、坦阳、白琳”;《英华萃林韵府》中还列举了1869年至1870年茶季期间在福州销售的茶叶名称,其中以吉庆祥瑞语词命名的居多,也有依其色香味、形状、采制时期不同等命名的,共有如“芝兰、芝蕊、紫纓、紫芝、紫桂、紫莲、长春、长生、贞利、真味、真妙、秋香……”<sup>⑪</sup>等300种之多,令人眼花缭乱。书中还详细辑录了“买卖茶问答”<sup>⑫</sup>条目,从中可窥见当时茶叶贸易工作的基本情形。

更为直接的是,卢公明还详细记录福州茶叶贸易的数据统计情况,他说:有数据表明,福

州的茶叶贸易是快速发展的,“1856-1857年间,从4月30日算起,广州出口茶叶21,359,865磅,上海是36,919,064磅,福州34,019,000磅,而这只是福州港茶叶贸易开始后的第三个年头。1859年7月起,广州向美国出口了3,558,424磅的茶叶,厦门是5,265,100磅,上海是6,893,900磅,福州则达11,293,600磅。在茶叶上市的季节,福州出口的茶叶总数比广州与上海的总和还要多将近一百万磅。……1863-1864年间的茶叶旺季,截止到5月31日,福州运往英国的茶叶额达43,500,000磅,到澳大利亚的是8,300,000,美国7,000,000磅,总计超过5800万磅。从这些数据中,我们不难看出福州在商业上的重要地位。由于红茶贸易的缘故,福州已经大踏步地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领事港口之一。目前有报道说,1850-1851年间英国政府考虑到福州微不足道的商业地位,曾打算放弃福州或考虑起用其他的港口。茶叶是福州的主要输出品,作为交换,它进口了鸦片、棉花、木制品、白银和一些其他小物品。截止到1863年12月31日,福州进口货物总值超过1050万美元,其中500多万元是用于购买鸦片的。与广州、上海不同的是,福州无丝绸可出口”<sup>⑬</sup>。上述这些辑录和记载,真实地为我们再现了19世纪中叶福州茶市的繁忙景象和茶叶贸易的兴盛状况。

西方传教士还关注到福州对外贸易辐射的情况。作为闽江商业交通枢纽和闽江流域下游通商贸易中心基地的福州,其贸易辐射网不仅上连闽北上三府,还经由海路扩散至北方和闽南、台湾及邻近国家和地区,这在传教士著述中也能窥见零星片语,如四美在著作中记到:“福州的贸易繁荣,尽管面临着这些束缚,在各种生活必需品方面与其他地方仍有大量的贸易往来。福州人从相邻的江西省进口瓷器,也从遥远的陕西省进口皮毛。帆船从山东、天津,及其他沿海地方运来蔬菜和药品。从宁波进口棉布,琉球群岛来的进贡船只也运来鱼干、燕窝、酒、海参,以及日本铸造的金锭,年价值在1万大洋左右。本省西北乡村提供日常家用物品,如茶叶、茶油、大米、竹笋、香木和牛皮。本省南部各地,尤其是厦门和泉州附近,从陆路运来藤

条、辣椒、布匹、毛料、海参、燕窝、檀香以及其他香木、人参、食糖和水银。水银等是南部富有冒险精神的人从其他国家进口到南部港口,然后从陆路运到省城,牟取暴利。作为交换,福州出口毛竹、茶叶、圆材(译注:制作船舶桅杆之木料)、柑橘,以及烧香拜佛用的锡箔纸”<sup>④</sup>。从四美的这段精辟叙述,不难看出当时福州处于闽江流域经济贸易网络体系的中轴核心地位,而这种格局在福州被辟为通商口岸后更进一步得到强化。

西方商品在福州最为畅销当属鸦片,福州海关报告在开头就点明:“自开埠至1855年,除了一些不纯鸦片的走私外,福州口岸没有什么价值。开头几年这种鸦片用来以货易货……”,由此可见,福州在开埠初期并未取得英国人预期的效果,仅有鸦片这一“不道德”的商品领有市场。鸦片大量流入福州市场,说明当时吸食鸦片群体的消费需求。晚清福州吸食鸦片成风的现象,也是这种西方“罪恶商品”冲击导致的一个结果。这一点在西人著述也多有体现。卢公明就曾记录了福州鸦片烟馆比米店还多及人们以吸食鸦片作为待客之道的现象。他“屡次闻说,福州鸦片馆比米店更多,中国人大半嗜吃此物”<sup>⑤</sup>,通过考察更发现,“这里的中国人有一句流行话叫‘烟馆比米店还多’。三四年前,在某个居民区里就有十二家鸦片零售店,卖米却只有七家,而米在中国这个地方是百姓的主食。在城市和郊区的烟馆数量据估算达几千家之多”<sup>⑥</sup>。可见,鸦片贸易给福州社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大量的瘾君子也导致了社会、家庭问题的滋生,对于当地的经济发展也有一定冲击,例如导致银贵钱贱和福建对外贸易的衰败问题等等<sup>⑦</sup>。

在福建口岸城市的城区内,商业贸易的兴盛还表现在街市经济的繁荣发达,具体来看反映在街道商店和做生意人群热闹嘈杂的场面,西方传教士在福州工作、生活期间就频频目睹这样的景象:“有许多肉店、鱼摊,用船从山东地区运来的风干的羊腿,还有奢侈品,像菱叶坚果、海蛎蚬,这些都是给海外移民的美味。很快,我们再一次经过通常比较拥挤的中国店铺,制作烟斗的、茶叶商、米店里各种商品上都贴有

明显的价格,还有纸张和锡箔制造商、织布机、一些珍品店、丝绸商人、制作小装饰品的、人造装饰花、最后是一些书店……”<sup>⑧</sup>;“沿着狭窄的街道布满了各式各样的商店,店门都开着,在里面展示着各类商品,的确,这些都呈现出一幅充满活力的画面。……华丽而活泼的瓷器店、米店、茶叶店、古董店、丝绸店、饰物小店、假花店、灯笼店、书店等到随处可见,应有尽有”<sup>⑨</sup>。相似的情况也见载于厦门口岸:“许多中国街道坐落着仅提供某种产品的商店。相比像厦门,这种情况在大的市镇更常见。在厦门,也有制靴街、篮子街以及被卖米店占据的街道等。商店通常处于混乱无序状态。……商店制造各种级别的展示品,也混合着平常的工艺和程序。这里有一种五金商店,柜台挨着路面,悬挂着各式各样混在一起的生锈的钥匙、锁、铜线、螺钉、铁锤及其他各种工具……”<sup>⑩</sup>。可见,口岸城市街市经济主要是延续着传统的发展步调,同时也呈现中西贸易带来的影响。

### 三、城市手工业传统的延续与成熟

晚清福建口岸城市手工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西势东渐”而带来新的契机,从而加快了前进的步伐。这方面,茶叶加工生产可谓典型表现。在西方与福建茶叶贸易蓬勃发展局面的刺激下,福建各地茶叶生产加工也是愈益兴旺发达,成为手工业领域的致富典范。

长期生活于榕城的卢公明,对福州制作乌龙茶的加工工序有一段细致描述:“新鲜的叶子只晒一小会儿,不等枯萎,但是要等到所有的露水或者水或外部的湿气都消失为止。把叶子放在铁器里,然后放在小火或温火上烘焙,而不是放在太阳底下暴晒。要不断地用手搅动茶叶以防止烧焦、变脆。不能完全烘干而只是半干。打着赤脚的男人踩着茶叶,把茶叶卷起来,然后在太阳下晒干或空气里风干。之后经过筛选,在铁锅里加热,这样手工制做的乌龙茶的茶叶就算好了”;由于卢公明曾在福州琼记洋行工作过,有较多机会了解茶叶的加工制作程序,故其介绍较为精确。制茶业的发达表明晚清时期茶叶贸易的兴旺,利用闲暇时间参加打工的制茶手工业者也因此能得到一定的经济收入,

“在福州郊区,许多企业在茶季雇佣了大批年轻小伙子、妇女和儿童。他们辛勤地筛选叶子,妇女和儿童每天可赚3~6分,这依他们的技术和知名度而定。他们自己管吃住,而男人们一天能赚5~8分,包括食宿在内”<sup>②</sup>;通过这些叙述,也可从一个侧面反映晚清福建制茶手工业的隆兴。

糖是西人关注的贸易物品,而制糖业又是福建传统的手工业的代表之一,对此,西文文献亦见记载。1849年1月间美以美会传教士麦利和(R. S. Maclay)与柯林(J. D. Collins)雇船溯闽江口从事考察,途经一家制糖工厂并记到加工厂手工劳作情况:“我们来到一家正在开工的制糖作坊。这座榨糖厂房是简易的木结构单层建筑。屋顶覆盖茅草。作坊内有一台碾压甘蔗的磨碾,一个收集糖渍的瓮缸,一个熬糖用的水壶。他们的磨碾和美国人酿制苹果酒工艺中榨压苹果汁的磨碾很相似。他们用小公牛拉动磨碾,尽管原理很简单、构造粗糙,但这套机器看上去运行有效。……我们考察的工厂只生产粗糖;在福建省内尚有不少生产白糖、圆锥形糖块、冰糖的精细加工厂”<sup>③</sup>。麦利和等人所察看到的制糖厂采用的是当时福州在全国比较领先的磨蔗煮糖法。对于这一技术,明末宋应星在其《天工开物》曾有详细说明,晚清时期福建糖的品种主要有乌糖(亦作青糖、赤糖)、漏斗糖(半白糖)、白糖和冰糖诸种<sup>④</sup>,麦利和在文中介绍的粗糖实际上就是乌糖。对此,卢公明也印证到:“有一种甘蔗,由于只以插条方式繁殖并可制成质量较差的红糖(即乌糖),人们大量种植。福州人用的最上等的糖是从本省较南部地区引进的,是用其它种类的甘蔗制成”<sup>⑤</sup>。不管糖的品级如何,传教士们都关注到福建蔗糖手工业生产的一些细致的状况;而作为福州传统手工产业,糖制品是颇受各地欢迎的产品,对此,西文文献也记载了福州在闽江中游属县尤溪县的糖品生产与销售的情况,根据当时一位外国人士的调查:“一制糖所输出额,每年大约冰糖四五千笼,白糖二三百笼,一笼约合一百十斤,而城内由此制糖所三十一户。……精制之糖一般运销厦门,更输送至上海、天津、牛庄等”<sup>⑥</sup>。

城市手工业匠人繁忙劳作是晚清福建城市经济生活日常场景之一角。四美在游历福州时期,记叙了福州城街道上手工业匠人繁忙工作的景象,“我们继续向前走,穿过唯一的街道。这条街大体上是相当典型的中国街道,至多在商店的文明和洁净程度方面有点差别。在街上,可以看到当地各行各业的手工业匠人在辛苦繁忙地干活,并销售他们制造的劳动产品。一间房有三种用途,既是工作间,也是仓库和柜台。在他们窄小的住处充斥着锻炉和铁锤震耳欲聋的声音,这里有一小组的拉线工,铜匠和纽扣匠;还有由四个人组成的铁匠群,快速地在铁砧上轮流锤打。这里还可以看到制作雕像的,制作灯具的,制作橱柜的,木匠,制作箱子的,木材车工,制革工人,鞋匠,裁缝,金匠,银匠,伞匠,弹棉花的,百货商,药商,玉石切割匠,雕刻印章的和装裱匠,各种手工艺为中国人的生活提供了必需品和奢侈品”<sup>⑦</sup>;对此,怀礼也有同样的记载:“拉丝工、冶炼工、制扣工、铁匠都分成小组,每组四人,交替着快速在铁砧上击打着。这里也可看见作画的、制灯的、做橱柜的、木匠、做大柜子的、旋工、制革的、鞋匠、裁缝、做金箔的、做伞的、弹棉花的、卖杂货的、石匠、雕刻工、油漆匠等,都在众目睽睽下完成他们的作品”<sup>⑧</sup>。相似的场景在厦门、泉州等福建沿岸城市也常见诸西人笔触,说明了晚清时期口岸城市手工业发展业臻成熟发达的程度。

#### 四、银票业的发展、 新式金融业与洋行的出现

近代口岸城市商业的繁荣,还体现在城市钱庄票号与货币体系制度的发展。卢公明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专门论述福州本地银行(笔者注:应指钱庄)业务、票据汇兑现金及借贷、商会组织等现象,为人们展示了一幅生动鲜活的晚清福州金融商业发展概况,例如述及钱庄银票业务的情况,他记到:“在1850年,这里的银票或现金的一元相当于1400个铜钱,在1854年相当于1750个铜钱,现在(1863年8月)则相当于1050个铜钱。……几年前,因普通铜币的极度缺乏,福州的满清官员本着清政府的利益发行了纸币。政府也发行了铁币。铁

币最初与铜币是等值的。但很快出现了很多伪造的铁币,而且生起了锈。而政府发行的纸币,本来可以用铁币支付并与铜币等值,却变得不受欢迎并大幅贬值。政府最后从流通领域收回铁币并撤回纸币,让私人银行象从前一样提供银票”。“福州拥有一些历史悠久的地方银行(即钱庄),其所有者以非常富有和诚实而闻名,它们的银票通常用在商业交易中,这些银票采用不同的单位,代表铜钱、元或白银。其面值不同,从四百个铜钱、五百个铜钱、六百个铜钱、一千个铜钱不等,到高达几十万个铜钱;从一元到几百或上千元;从一两到几百或几千两银子。经验证明来自伪造者的风险较小。人们更喜欢用银票代替现金,除非卖主想将钱用来购买小物件,或付给不同的人。真正的风险来自于钱庄突然倒闭的可能性”<sup>②</sup>。据外国人观察,在1867年前后,“福州本地银号有90家,20家在城内,70家在城外,资金最大的据说有45,000两。城外70家中有12家大银号,每家拥有资金银15,000到20,000两,其余均系小银号。”<sup>③</sup>

银票业务是晚清福州商业活动最为显著的一项特点,1840年以前,当铺、钱庄、票号等旧式金融机构在福州即已存在并十分发达,它们“大部分拥有较大的资本,这些钱庄都收受存款,签发票据……由于钱庄信用卓著,中外商人对钱庄签发的票据视为与现钱无异”<sup>④</sup>。英国领事巴夏礼(H. S. Parkes)曾对1850年左右的福州纸币和钱庄业务有过专门研究,他发现:“在福州,纸币被广泛应用于流通领域,很受人们关注;银行(钱庄)系统从事有关的业务,这是该地区商业贸易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sup>⑤</sup>;美国传教士汉学家卫三畏(Samuel W. Williams)对福州票据业也有一定描述:“福州发行的票据甚至比英国银行发行的纸币版式更大,把边缘部分包括进去,约长10英寸、宽4英寸,但票据四周边沿部分相较纸币更短而窄。票据右边部分戳盖着各式各样的印花、图章和刻写的标志,所有的票据都一分为二,另外一半由钱庄留存,作为票据于某时已支付的凭证;从这里我们可推断纸币可能产生于银行(钱庄)在印刷书籍时,填之以票据内容以应人们所需”<sup>⑥</sup>。上述

西文文献的记述不仅真实再现了旧式商业和金融业的运作和惯例,也反映西式的金融商业惯例对传统金融业的渗透和冲击,如本地钱庄的票据业务就明显受到了来自外国银行的纸币业务与银元买卖等活动的影响。

西方新式金融业对福州更直接的冲击表现在银行的出现,晚清开埠后的很长时期内,开办经营银行一直是由外国人操纵的行为。1850年,英国丽如银行(又称东方银行)在福州设立分行,这是最早来榕的外国银行。1861年,英国汇隆银行在福州设立代理处,著名的汇丰银行则于1865年在榕设立分理处,并于1868年升格为福州分行。至1882年,共有7家外国银行在福州设立了分支机构<sup>⑦</sup>,形成了福州现代银行业的雏形。这些在榕银行机构主要经营的业务为国际汇兑、金银买卖和发行纸币。不过,外国银行业务主要是针对在华从事经济活动的外商,对华人金融业则没有完全开展,其竞争力也比不上相对更为灵活的本土钱庄业,故其影响还是有一定局限的。

洋行是配合外国商人在华从事经济贸易而开办发展起来的,并逐渐从代理中外货物的订购运销等传统业务演变成“担任各式各样的职务”,如与本国商号联营、办理金融汇兑、借贷业等,还涉足于轮船修造、食品加工、保险、证券以及房地产等经济领域<sup>⑧</sup>,是西方商品经济对中国口岸城市经济冲击的直接表现之一。福州开埠后,洋行也不例外地在此产生和发展起来。根据闽海关总务课主任李瓦特的统计报告,1867年福州已有15家英国商行,3家美国商行,2家德国商行,1家布律吉商行,3家银行,2家货栈和1个印刷局<sup>⑨</sup>。洋行的活动对口岸城市社会经济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它们是中外商品贸易需求下的产物,同时也逐渐成为了地方城市经济活动的构成要素之一。直至今,在福州城市的原经济繁荣区的老街道和原外国侨民寓居区,还遗留着一些洋行的遗址<sup>⑩</sup>,见证了近代中西经济交融互动的沧桑历史。

## 五、余论

晚清以来,通商口岸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演变格局,是“西力东渐”与口岸城市内部经济

社会运转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西方资本主义对口岸城市商品市场的侵入,一方面将西方商品首先倾销输出至沿海口岸城市;另一方面则继续着对中国商品的进口,也为当地的农产品和生产加工业提供了商机。正是在这样的境遇下,通商口岸城市经济社会内部的发展也呈现出与以往大不相同的动态格局。详究其因,概言之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福州作为省会城市与闽江交通、经济枢纽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其身处商品经济中心的核心角色。来自闽西北的农副产品等货物集中运贩福州的格局已形成传统,牢不可破,邻近省份的贸易也集中于福州;另外,中国与琉球的朝贡贸易也限定在福州一口,这种格局直至近代依然有序地延续下来。其次,中外贸易的需求刺激了福州本土经济的发展,尤其以茶叶贸易为代表,表现出新的气象。从1853年起直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福州茶叶出口量一直处于上升态势,福州成为三大茶埠之一<sup>⑤</sup>。这固然与茶路变化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反映出中国茶叶市场与外国贸易的需求增加,对此,我们从晚清开埠后前往福州从事商业贸易的洋行、洋商不断增多也可窥见,即如当时《申报》所记:福州之“南台地方,为省会精华之区,洋行茶行,密如栉比”<sup>⑥</sup>。每逢茶季,“洋商采买,聚集福州”<sup>⑦</sup>,外销红茶均集中福州分类包装,然后发运欧美,从而形成福州茶市。这一状况,也决定了晚清闽江驳船运输的兴起,因为闽江航道无法通大船,需用小船装驳,再运至停泊在马尾洋面的大船上;同样,外国货物运至福州城内也是如此。当然中外贸易对地方经济的刺激不仅表现在商品贸易上,其影响力远及农副业的生产、种植和加工等;如在鸦片贸易的影响下,福建本地也开始大量种植罂粟,当时在福州、厦门活动的西方人,皆对当地的此一现象进行了记录<sup>⑧</sup>。

再次,西方商业制度对福州本土的冲击和影响。海关、洋行、西方金融、货币、银票业等因素,构成当时西方人操控经济的主要手段:海关把持着进出口货物检查、课税等;洋行掌控商品买卖并催生中国的买办阶层;银元等西方货币流入福州市场使得当地货币体系作出应对和调

整;银票业务则反映了贸易发展的需求,并同时福州本土钱庄业务产生竞争机制与刺激作用,使得本土票据业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元素,等等。

总之,引导晚清开埠后福州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变化之因素是多方面的,不一而足;但“西力冲击”绝对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关键性构成要素,而透过当时来华西人的视野,或许也可在某些程度上感受到时代经济的跳动脉搏。著名历史学者王尔敏教授说到:“五口通商则表现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大关键,虽是被迫,自也是对世界开放,逐渐显出与五口通商前之中国显著不同,亦可谓是一个重大分野”<sup>⑨</sup>。借助晚清来华西人对福州城市史的记述,可以深化今人对口岸城市社会经济变化与开埠前之不同状况的认识,更令人深刻感受到口岸城市经济繁荣活络的动态气息。在西力冲击和本土经济驱动力的双重影响下,城市经济的发展在延续传统格局的同时,也显现出中西贸易往来程度加深与西方经济模式移植等特征。这样的时代处境,不仅对城市经济发展提出新的问题和契机,也对民众的生活模式带来了新的影响要素。东西方贸易交流的深层互动,带来的不仅是城市经济发展变迁的内外驱动力,也间接地导致在其他层面,诸如政治、文化、教育、社会事业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这些都使得福州的城市发展不可避免地烙刻上了“西方元素”的印痕。

#### 注释与参考文献:

- ①参见林庆元主编:《福建近代经济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王尔敏著:《五口通商变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等。
- ②(清)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98页。
- ③《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1865—1928)》,载池贤仁主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北京:华艺出版社,1992年,第1页。
- ④参见池贤仁主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47—50、58—60页;林庆元主编:《福建近代经济史》,第172—177页;另外,笔者也在西方人著述的老照片中经常见到万寿桥江面附近西方轮船与本土船只密集交汇的情景,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福州中外商品贸易往来的盛况。参见吴巍巍:《西方传教士与晚清福建社会文化》,北京:海洋出版社,2011

- 年,“第四章”。
- ⑤(英)施美夫著、温时幸译:《五口通商城市游记》,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262-283页;参见原文 George Smith, *A Narrative of An Exploratory Visit to Each of the Consular Cities of China, in the years 1844, 1845, 1846*, London: Seeley, 1847, pp. 287-299.
  - ⑥George Smith, “Notices of Fuhchau fu?”,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 V, (April 1846).
  - ⑦Eugene Stock, *The Story of the Fuh - Kien Mission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London: Seeley, Jackson, & Halliday, 1882, 2nd edition, p. 5.
  - ⑧I. W. Wiley, *China and Japan*, Cincinnati: Hitchcock and Walden, 1879, pp. 179-180. 另参见中译本(美)怀礼著、王丽等译:《一个传教士眼中的晚清社会》,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第92页。
  - ⑨详情可参见郦永庆编选:《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福州问题史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
  - ⑩参见(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406页;程镇芳:《五口通商前后福建茶叶贸易商路论略》,《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2期。
  - ⑪Justus Doolittle, *Vocabulary and Hand - 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Rozario, Marcal and Company*, 1872, vol2, pp. 559-562.
  - ⑫Re. Justus Doolittle, *Vocabulary and Hand - 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vol2, pp. 656-657.
  - ⑬Justus Doolittle,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New York: Hap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865, Vol. 1, “Introduction”, p. 3.
  - ⑭(英)施美夫著、温时幸译:《五口通商城市游记》,第289页;参见原文 George Smith, *A Narrative of An Exploratory Visit to Each of the Consular Cities of China, in the years 1844, 1845, 1846*, p. 319.
  - ⑮(美)卢公明:《劝戒鸦片论》,亚比丝喜美总会镌,1855年,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缩微胶片。
  - ⑯Justus Doolittle,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Vol. 2, p. 355.
  - 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456页。
  - ⑱George Smith, “Notices of Fuhchau fu?”,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 V, (April 1846).
  - ⑲I. W. Wiley, *China and Japan*, pp. 187-188.
  - ⑳Edwin Joshua Dukes, *Everyday Life in China or Scenes along River and Road in Fuh - Kien*, London: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885, p. 25.
  - ㉑Justus Doolittle,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Vol. 1, p. 49.
  - ㉒R. S. Maclay, *Life Among the Chinese*, New York: Carlton & Porter, 1861, pp. 183-184.
  - ㉓参见唐文基主编:《福建古代经济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24页。
  - ㉔Justus Doolittle,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Vol. 1, p. 43.
  - ㉕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6页。
  - ㉖George Smith, “Notices of Fuhchau fu?”,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 V, (April 1846).
  - ㉗I. W. Wiley, *China and Japan*, p. 187.
  - ㉘Justus Doolittle,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Vol. 2, pp. 139-140.
  - ㉙《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1865—1928)》,载池贤仁主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60页。
  - ㉚George Smith, “Notices of Fuhchau fu?”,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 V, (April 1846).
  - ㉛H. S. Parkes, “Account of the Paper Currency and Banking System of Fuchowfoo”,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vol13, 1852, p. 180.
  - ㉜Samuel W. Williams, “Paper money among the Chinese, and description of a bill from Fuhchau”,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 X, (June, 1851).
  - ㉝《闽海关十年报 1882~1891年》,载《福建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87页。
  - ㉞参见汪敬虞:《十九世纪外国在华金融活动中的银行与洋行》,《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林日杖:《鸦片战争前后外国在华洋行经济活动初探》,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
  - ㉟《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1865—1928)》,载池贤仁主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第60页。
  - ㊱参见曾意丹主编:《福州旧影》,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
  - ㊲陶德巨:《福州开埠与近代福州茶市》,《古今农业》2001年第3期。
  - ㊳《申报》,光绪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 ㊴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612页。
  - ㊵Re. J. Sadler, “The Poppy Growth About Amoy”, *The China Review*, Vol. 22, No. 5 (1897).
  - ㊶王尔敏著:《五口通商变局》,第2页。